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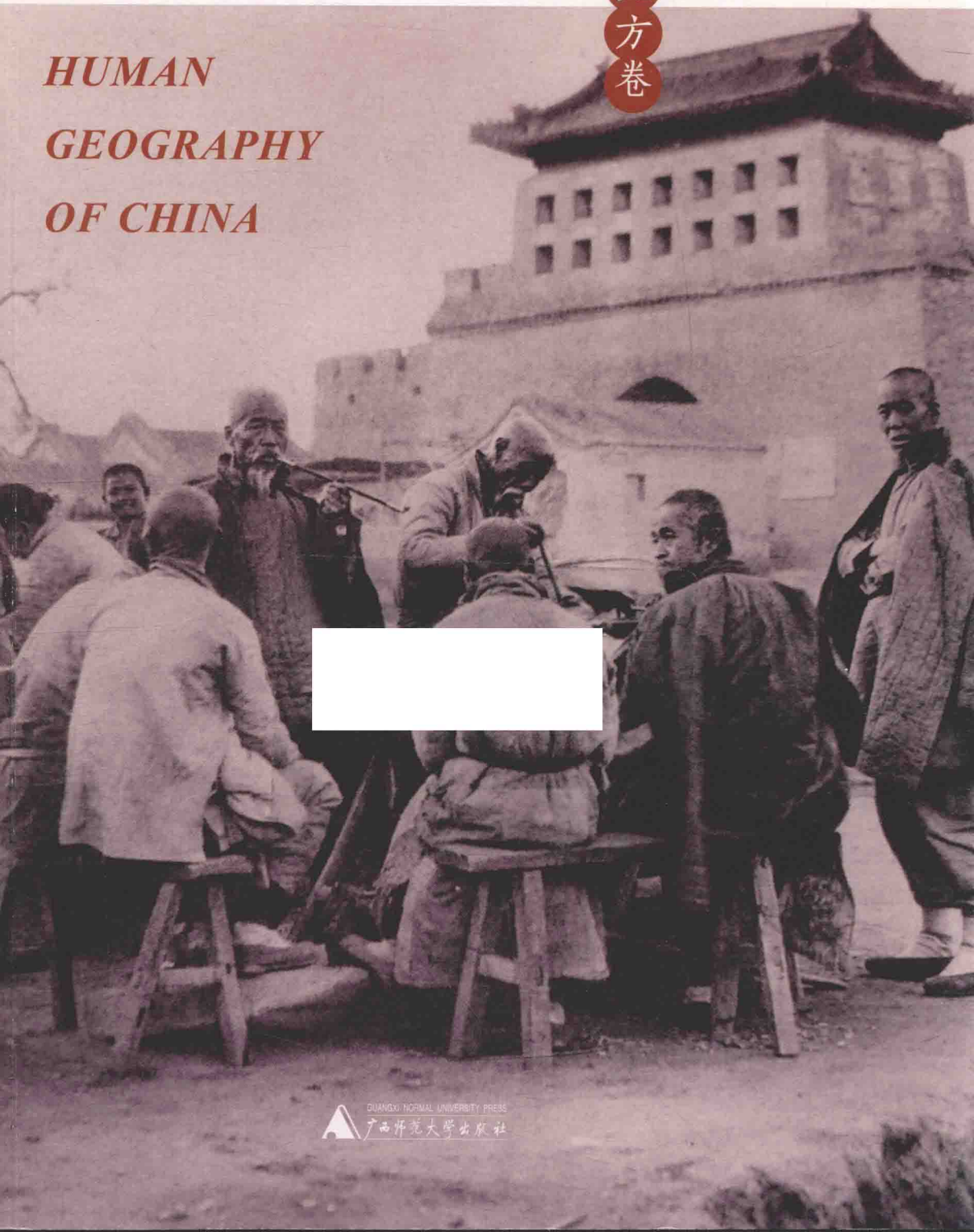
山河万朵

中国人文地脉

白郎 / 著

*HUMAN
GEOGRAPHY
OF CHINA*

北方卷





山河万朵

Human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人文地理

北方卷

白郎 著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山河万朵

SHANHE WAND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河万朵：中国人文地脉. 北方卷 / 白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495-9033-9

I. ①山… II. ①白…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3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400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山河万朵

Human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人文地脉

【北方卷】

目录 CONTENTS

001 山河·唤·回·昨·日

——南北人文地脉

——国外大家说中国传统

——世纪中国的灵告之声

012 燕·赵·慷·慨·悲·歌·之·地

021 经营天下非燕不可

025 秘香从土地里升起

——喧哗光影消散于乡愁

——燕赵天凉好个秋

031 英雄主义沃土

——铁血是一种罪

——纵死犹闻侠骨香

——从匣中抽出的金刀渐渐生锈

041 鼎以三足而立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

——北国“恶之花”

——帝都的天鹅绒大幕

055 被帝国斜阳刺中的北京

——马背上的万里江山

——一抹晚清夕照

——京味的沐浴

——迎向衣钵消逝年代

075 宦官之葵花宝典



云冈石窟北魏造像

080 齐鲁天下根

089 鲁人与齐人

095 孔子是一轮月

100 星群闪耀之时

——圣人中的圣人

——姜太公的屠牛术和垂钓术

——山东宰相山西将

——孤松与狐仙

111 好汉们的家乡

——两个文人的济南

——海神在蓬莱出场

——梁山泊的蓝焰

——山东大汉闯关东

127 古老东方之巅

山河万朵

Human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人文地貌

【北方卷】

132 大西北白银时代

141 亚欧大陆的脐带

——由丝绸衍生的诱惑

——西域三十六国

——马中东方偶像

——和田玉华丽纪

——一个粟特人的唐丝路

167 魔镜照耀着亚洲腹地

——敦煌黑暗书

——西夏灵魂故地

——大漠之花楼兰

181 神秘来自时光之蛇

——圣者鸠摩罗什

——琵琶簪缨世家

——一个18世纪的尤物

193 刀锋上的古典黄金

目录 CONTENTS



敦煌千佛洞唐代彩绘

198 中原梦华录

207 九朝故都风水传奇

211 传统是坚韧的担架

217 黄河上的哀鸿

223 儒家身子佛家骨

229 遍地高手下夕烟

——以三寸之舌为王侯师

——那巨鹤掠过政治

——傲杀人间万户侯

238 秦中自古帝王乡

245 百二河山紫气东来

249 昨日龙脉明月为灯

253 一声老陕，茫茫故乡

——南北陕西人

——米脂婆姨绥德汉

——筑声里满座衣冠似雪

——开琼筵飞羽觞的秦人

263 从大汉之都到大唐之都

——汉长安，樗里子的预言

——唐长安，三百年繁花

——万千金粉归为黄土

273 响当当的历史舵手

——江山属于浪荡之徒

——杨广的大头症

——贞观大帝的征服

——手持菊花笑傲江湖

——黑夜里的素士



山河唤回昨日

奥克塔维奥·帕斯说：“对现代性的追寻让我们回到传统。”昨日是一面祖先的镜子，镜光射向明日，当我们凝视这镜光，可测试出今日的深浅。

把国喻为龙，是一个极端比喻。天地的筋骨透出一丝蓝，龙缥缈绝尘地浮在光中，闪动着神秘的亮鳞和灵趾，吸收日月的精气，姿态绝伦，舌上衔着朵洁白大花。龙滑过天地，一点点与天地融为一体，成为天地的一部分；天地在龙的里面，也在龙的外面，龙来自于天地，亦归于天地。

百川赴海，千峰向岳。水是龙之血，山是龙之骨。中国的苍茫龙体，横贯一万里，上下五千年。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国，郁何累累。山河唤回了记忆并将它收拢于自己漫长的额头。寥廓一笑间，顺着龙之脉，我们驾一叶扁舟逍遥于昨日烟海，顺着龙之脉，我们乘一匹高头大马驰骋于昨日大地。

一尘举，世界起，一花开，大地收。生死契阔，归路云深。里尔克说：“生与死，同属一个核心。谁了解自己本来的家世，谁就会将自己酿成葡萄酒，投身于最纯粹的火焰。”这个核心是大地之爱，归根，复命，在钢筋混凝土时代，怀揣乡愁，努力做有根的中国人。



南北人文地脉

人文地脉是文化中国的一个载体和气场。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国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是中国结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条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来以长江为界大概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一则幽默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以大象为论题写一篇文章，德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情爱》，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则是《大象的伦理道德》。

另一则幽默说：一幢杂居着各国人的大楼在失火后，犹太人首先背出了钱袋，法国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到处寻找老母。

这两则幽默形象地把隐藏在心灵世界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渲染出来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淮河以南的橘树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橘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结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满釉彩的鲜活个体，生命从来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人恰恰是区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活态文化的一种呈示。

巴克尔认为有四个主要自然因素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气候、食物、土壤、地形。泰纳·勃兰克斯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只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从一个角度讲，这只“无形大手”，就是由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叠加而成的人文地脉。

人文地脉线团状的长期性沉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梁启超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繁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玉米、大豆与小麦，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凸显出来了。而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所以有着灵巧的心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视政治的个性就较为突出。鲁迅曾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从相貌上看，北人长南相或南人长北相者为佳。王国维对南人和北人的评价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下面林语堂的这番话，是比较能抓住南北人文差异特点的：



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喜欢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种族的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画卷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一阴一阳之谓道,北方属“阳”,南方属“阴”。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重、敦厚、朴实、壮阔,南方文化像流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20世纪后期,全新形态的移民浪潮呼啸而来,南人与北人的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

若以区域文化详细划分中国文化的话,可以划分出很多,主要类型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本书对其中典型性板块的经典细部进行了深度挖掘,想要在综罗百代与广博细微之间找到一扇散发着微香的“月亮门”。

在广袤的怅惘和流逝中,中国那无比古老、硕大漫长的鲜活身影浮现在本书中。历史是中国的羁绊也是沃野,如费正清所说,如果中国人要想对今天作出正确的评断,就得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四千年所有的历史遗址都紧密地靠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这好像是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提依神庙建筑在波士顿的邦克山上,汉尼拔越过了阿勒格尼山脉,恺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举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纽约的中央花园一样。”

瞄准“中国人文地脉”这一靶心,我们大可以施展身手,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历史更是长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和喜欢回忆历史的美国人大不相同,美国历史就算从1776年算起,到今天也只有200多年,难怪法国人讥讽说,美国人喜欢回忆历史,但一回忆到他们祖父的父亲那里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



早期赴华传教士画像

国外大家说中国传统

怀着对东方的憧憬,1795年,美国费城富商斯蒂芬·吉拉德组建了一支专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船队,船队所属的四艘大船分别被命名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在吉拉德看来,这四名西方哲人都对中国文化怀有特殊好感,但很显然他并未认真阅读这四人的书,否则不会如此轻下结论,四人中伏尔泰确实怀有某种对中国的敬仰,其他几人却未必。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引起了伏尔泰的高度关注,他以此来猛烈抨击教会对欧洲社会的干预,在论述世界历史的《论各民族习俗与性格》一书中,伏尔泰将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他甚至令人吃惊地以中国纪年而不是圣纪年来论述世界。卢梭认为中国式教育对人性中本来的高洁品质形成了阻碍,有人曾批评科举考试制度说,“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也许卢梭是在表达类似的想法。18世纪最初的几年,二十多岁的孟德斯鸠曾和长期生活在巴黎的中国天主教徒黄嘉略有较深接触,孟德斯鸠意识到儒家思想中有一种美好的“世界精神”,同时非常反感中国株连无辜的连坐法,认为类似的谬误在中国法律中还有不少,正是这些谬误极大地遏制了个人自由。孟德斯鸠觉得自己比较了解中国,但在地理学笔记中他却写下这么一句话:“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



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一种停滞性,中国社会深陷在僵硬的政治体制中。以中国文化的停滞性为轴心点,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佩雷菲特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中国的反……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也许拉尔夫·爱默生的话集中体现了19世纪大量西方知识精英的看法:中国要想进入近代世界,就必须得由西方人来“重塑”一番。

1634年夏天,北美洲五大湖发生了严重的部落冲突,这些冲突威胁着法属殖民地的皮毛交易,一个叫杰恩·尼克雷的人从魁北克出发前去解决问题。一天,一个土著居民带他去密歇根湖,尼克雷深信,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湖对面就是中国,为了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准备了一些礼物,还特地穿了一件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中国绸袍,上面绣有漂亮的花朵和彩鸟。尼克雷的“中国往事”令人发笑,但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四百多年过去了,世界变得面目全非,中国变得面目全非,在狂飙突进的巨大轰鸣中,人类已处于高速运转的“地球村”时代,无论赞扬还是否定,许多旧日的评价犹如尼克雷的发现,已不适用于当代语境。

今天,全球化实质上是以西方为主轴的一张世界图纸,在无可奈何的枯萎中,中国传统的精神根脉和深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遮隐。从现代性的诉求和程式来看,中国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和种种弊端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深受物质文明泛滥之苦的人类来讲,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那种与自然同体的世界主义的东西,无疑对未来的世界有着极大启示,因为对人类来说,“世界必须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陷于悲惨结局的唯一道路”(汤因比语)。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这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作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尽善尽美的描写。现在看来,该书显然不尽正确,甚至荒谬之处颇多,但书中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颂词,却一直在引发人们的关注。

在欧洲历史上,康德、谢林、亚当·斯密、威尔斯、托尔斯泰、沙畹、雅斯贝尔斯、弗赖、托尼、李约瑟等大哲都高度关注过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体的中国人文精神。汤因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有人问及如果允许他在世界历史的某一瞬间重新降生,愿选择何时何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向往的神情说,愿意降生于公元1世纪的中国新疆(也就是那条刚刚兴盛起来的闻名世界的丝绸商道上)。汤因比生前曾多次提及,中国在未来将扮演人类文化主轴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已过去的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实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敬畏,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招致挫败。这是道德带来的最宝贵的自觉。

第六,这种自觉是佛教、道教与中国所有哲学流派共同具有的(除去已灭绝的法家)。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西方人虽然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但东亚各国将可以战胜他们。

汤因比显然对20世纪以来中国人自己否定传统后的无根化状态认识不足,但他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温和的世界精神,有一件事情可从一个侧面来证明: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发现明朝军队是他周游世界所见到的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这支强大的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过要用强大的武装去征服世界(见利玛窦《中国札记》)。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的两大特点是爱好和平与敬神尊祖。费正清强调中国的人文主义特点是:忍耐、爱好和平、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和有学问的人等等,这一切体现了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而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保守安逸生活,正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生活。李约瑟则认为中国人的特征是道德伦理观念较重,具有恭敬的自谦的处世心态和人道主义精神,另外,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和大同思想也是非常突出的。

在歌德看来,传统中国是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保持节制的民族,这正是它的文化从不间断地传承了几千年之久的原因。这一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

学者出身的印度前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则认为,美一直拯救着历史上的中国人,并将继续拯救中国人:“中国人是爱美的。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宫殿。一切物体——城市与庙宇、田野与花园、桌子与椅子、小小的茶杯与筷子等等,中国人都想使它们变得美丽。最贫穷的仆人也以美的方式吃光剩饭。美是他们生活的面纱,是他们田园的色彩。”

《阴符经》开篇即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透过中国人文精神那陈旧静美的阔大面庞,穿过中国深厚而古老的传统大地,蓦然回眸,我们实际上已经察觉到,无论是灿烂的荣光,还是沉重的耻辱,中国古老传统最动人之处,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而敞开的亲密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正所谓:“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体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世纪中国的灵告之声

失败之年——1895年，海军出身的“海归”严复在甲午战争后的一团愤懑之火中抛出了《天演论》译本，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天演论》的原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此前两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该书中，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书的后半部分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生物进化论——这也正是达尔文本人的看法，尤其在晚年，达尔文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进化论。然而，正值国难当头之际，严复毅然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掉，将社会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物竞天择”这一高度影响此后百年中国的判词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第二年，在上海读到《天演论》的梁启超，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



18世纪西方描绘的孔子和中国读书人

发出“适者生存”的观念，发表了激烈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新民说》《新史学》等影响极大的文章，振聋发聩地宣告“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呼唤进行社会变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在19世纪末的急风暴雨中，社会进化论思想风靡整个中国。

由此，20世纪在中国成为与祖先为敌的新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误读，并一步步激化，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当时有一个小孩叫胡洪梓，在他成年后，将名字改为“胡适”，取自“适者生存”。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尚能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的同时应使原有的古老传统重获新生，而不是完全代替它。但绝大多数精英却认同新文化必须和旧文化决裂的极端理念，如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代名词是“吃人”，塞满了黑暗和愚昧，如闻一多宣称自己在中文系任教，“目的是要和革命者‘里应外合’，彻底打倒中国旧文化”。

对此，余英时感慨道：“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中国文化的态势何尝又不是“两边都靠不上岸”，古老的《周易》中有一个“阳主阴从”的原理：万事万物都有其主体性，也就是“阳”，而“阴”是各种各样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只有“阳主阴从”，“阳”不断获得肯定，“阴”不断被“阳”所用，方是事物流衍过程中的正道。拿中国文化来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富含本土特质的内核，就是主体性，也就是“阳”，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只有不断肯定这一主体性，并很好地吸纳时代大潮的各种养分（也就是“阴”），中国文化才能保持良好的、具有时代内在均衡感的文化生态场。但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命途可以说走的是一条“阴主阳从”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走向了非中国化生活，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了非中国化状态。

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中，面对现代化与传统的鏖战，朱学勤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并行不悖的。”

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传统中国文化属于极度亲自然的道德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人和自然的一体化，如陈寅恪所说：“求融合精神于运动中，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境，自身没有孕育出基督教式的一元性神格宗教，它的母胎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先验的至高创造神。类似于西方的神格宗教因素被人心中无限的宇宙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取代了。

认识孔子的“礼”“仁”“乐”思想，有助于真正认清中国式人文精神的要旨。在孔子看来，人类始终处在某种混乱黑暗当中，所以，为人类建立恰当的具有规范性的秩序和制



度是必须的,在这种合理化的秩序和制度里,人与人能够美好地共处,即这种秩序能够给人类提供最大的安全感与亲和力。这种秩序就是“礼”,它是人们必须遵从的社会伦理律令,也只有遵从它才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外部人文环境,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另外就是“仁”,如果“礼”是外在的人文秩序原则,那么“仁”就是内在良知的示现,这种心灵深处的充满善和爱的力量,从内向外散发出来,成为自觉的心灵实践。一个遵从“礼”和“仁”的人,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如果大家都是君子,世界又何至于“礼崩乐坏”呢?反过来,“仁”同时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它限制人自身的“恶”,引导人向“善”靠拢,所以中国古代的有德之士总是要“慎独”,即自己观照反省自己,而不是向神忏悔。再就是“乐”,这里的“乐”已不简单指的是音乐了,而是超越了一切内在、外在桎梏的心灵觉受,是泛宗教情感意义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灵告之声。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乐”,那他就已与光同尘置身于天地的无限性之中,与其融为“不一不异”的一体,实现了生命自身的解放,尽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完成生命自身的超越和感恩。总括起来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是内在的约束力,“乐”是对自我的灵性解救。“伦理”(礼)、“道德”(仁)、“天人合一”(乐)三者复合地统一起来,就是孔子为人类开出的救世救心的药方,它向人们表明了人生实际上是本自具足的美学盛宴,生命能够自己实现解放,它的救赎和施洗之路并不来自神秘的、外在于万物的至尊神性。

在中国文化中,外在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包裹着“灵”与“肉”的有机体,这两个的整体即“大宇宙”和“小宇宙”,它们互为依存,熔融直贯。所以方东美的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弥漫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造神力向前推进,即能巧运不穷,一体俱化,恰如优雅的舞蹈,勃力内转而秀势外舒。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一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

辜鸿铭曾经指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他拿毛笔来比喻中国人的精神,颇为精彩独到:是的,用毛笔书写和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创作出精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在中国古代,拥有最高理想人格的人是那种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君子,他是深谙中庸之道的高尚仁者,所作所为有如“和”这种乐器。“和”,相传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器,它发出的声音能够协调世间的一切声音。对于这种圣人境界,曾国藩曾教育自己的儿子说:求功名富贵,半由人事半由天命,而努力学做一个圣人,则完全靠自己的努力。